

一、概 述

15 至 16 世纪 欧洲各国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千多年的统治开始崩溃，各种新的思潮纷纷出现。而新起的市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也产生出来并成为反对封建神学世界观的主要思潮。当时欧洲学术思想的这种变化，是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化的反映。

在当时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封建行会和封建庄园经济逐步解体，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开始形成。

14 至 15 世纪，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萌芽。15 世纪末、16 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极其有力地刺激了欧洲各国的生产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特别是在大西洋沿岸的尼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关系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欧洲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了封建社会原有的各个阶级（其中封建主和农民是封建社会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之外，开始形成两个新的对立阶级：从中世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中世纪城市居民中最低下、最无权的阶层则渐渐变成前无产阶级即当时的“平民”他们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

新产生的市民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夺取政权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它当时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以便开辟国内市场并扩展海外殖民活动。因此，它依靠着专制王权的势力，展开了反对封建贵族割据、反对罗马教廷统治的斗争。同时，它还需要借助王权的势力控制劳动群众以便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进行资本主义的“创业”活动。

广大农民群众身受封建地租贡赋、教会什一税的压榨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大批离乡背井，沦为乞丐和流浪者。公元 1525 年，德国爆发了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它给予封建教会统治以最有力的打击。正在出现的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们，同农民一起反对封建统治者。同时，他们和市民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16 世纪法国里昂印刷工人的罢工就是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进行斗争的最鲜明例子。

在欧洲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动，新世界、新航道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社会生产要求急速发展的伟大变革时代，政治、哲学、科学、文化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破旧立新的巨大历史任务，需要革命阶级的先进人物去奋斗、创造，加以完成。

首先，农民和平民革命派卓越代表人物、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以一定的明确性提出了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他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中吸取了关于对堕落的教会的末日审判和千载天国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的政治纲领接近于共产主义。他的这个纲领，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

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以幻想小说的形式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性作了揭露，初步提出了财产公有、人

人参加劳动等伟大的社会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状况和要求。

市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打出“新教”的旗帜进行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欧许多国家和地区摧毁天主教会统治，取得初步胜利。与此同时，市民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展开了最早的反封建的“世俗”文化运动——人文主义运动，创立了新的自然科学，并且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说。

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摧毁了天主教神学对西欧社会思想千百年来的严密统治，它使人们的眼光从虚幻的天国转向现世人生、转向自然。它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反封建斗争中具有革命的意义。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上表现得很明显。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有反封建神学的一面，又有同封建神学妥协的一面。许多人文主义者依附王室，鄙视人民群众。当时市民资产阶级的哲学学说，既包含了唯物主义思想，又保留有神学的杂质。

在文化教育上，市民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研究古代语言、历史、哲学和文艺，搜集和整理古典著作抄本，发掘古代历史文物，按照古典作品的范型进行文艺创作。古典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蔚为一代的风尚。而“文艺复兴”的名称就是由此得来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从其本阶级的需要出发，利用古典奴隶主阶级的“世俗文化”来反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哲学，并由此各自设计了新的教育模型，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实践探索。

15 至 16 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的中心是意大利。这是由于在这个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得最早，资产阶级的

势力也较为雄厚。到了 16 世纪，意大利由于内部分裂和外国入侵，加以欧洲贸易和航海枢纽已经移到大西洋，因此它的经济发展呈现衰颓趋势。到了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上半期 欧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中心才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国家。

在遥远的东方，日本经过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到德川氏在江户建立幕府统一全国，重新组成了封建集权制的国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演变，日本中世纪的文化教育终于脱离佛教的控制而独立出来，在江户时期出现了儒学、国学、洋学三大系统的学术派别 呈现出文艺复兴的新开始。随着文化、科技、学术的发展，教育机构也在增多，教育机构的类型也趋向复杂化。在中世纪，日本从中国吸取了自己的精神营养，经历了由模仿中国逐渐形成国风文化的路程，建立起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这是日本中世纪教育的突出特点。

日本是一个善于取他国之长以补自己之短的国家，日本民族是富有强烈进取精神、勇于学习新事物的民族。在江户时代，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袭击，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在逐渐成长起来，因而对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等发生了兴趣。在已经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基础上，上层统治阶级着重吸取中国宋朝和明朝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下级武士和开明藩主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力摄取，因此形成儒学、国学和洋学的各种流派之争，并且在竞争中创办传授各种学说和文化知识的教育机关。这就为明治维新作思想准备，培养了维新志士，也为近代教育打下了基础。

明末清初，在中国古老帝国的茫茫大地上，萌发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绿草地——启蒙主义及其实学教育思想。它的萌发 乃是由内外各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自明中叶始，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万历实录》言：“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这里机户和机工的关系，已经是资本占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与手工业生产发展相适应，商业更趋繁盛，商品流通更加扩大，出现了繁华的都市。在这些繁华的都市里，市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不断增长，这时思想学术、文化艺术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影响。

此时期王守仁（公元 1472—1528 年）的“心学”以其反对程朱理学束缚人性的思想，刺激了被程朱理学统治的思想学术界；以王艮（公元 1483—1541 年）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尤其是李贽（公元 1527—1602 年）更是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大胆批判儒学，反对禁欲主义，疾呼解放人性，实具振聋发聩之作用。

其次，明末社会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清贵族的乘机入关，整个社会呈现了天崩地裂之势。此时的知识分子，面对封建专制的黑暗现实、忧国忧民，议论时政，提出了各种具有民主思想因素的救治社会的方案。而明亡之惨痛，更使他们痛定思痛，回顾和总结历史教训，掀起了反理学的思潮。

再次，西学的东来，犹如清新的春风，催促着孕育在古老帝国土壤中的启蒙思想的种子发芽破土而出。在教育理论方面，则构成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潮。

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复古”与教育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教育是在“复古”的口号中提出并得以实施的。它的文化哲学基础是借鉴于古代希腊、罗马典籍中的原始人本主义，同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刺激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料。

1.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文化哲学基础

(1) 文艺复兴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欧洲从 14 世纪下半叶到 16 世纪末所经历的时代，通常称作文艺复兴时期。按其社会性质讲，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个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新兴资产阶级从城市市民中分化出来。与此同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十分尖锐。

“文艺复兴”运动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斗争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整个反封建、反教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没落与资本主义新文化的诞生。在这一运动中，大批先进的思想家，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广泛的领域内对宗教神学、经院哲学和各种旧的传统观念开展了无情的批判与斗争。他们

最先主要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思想，同时，又特别重视继承和利用在中世纪遭到摧残的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作为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想武器。

文艺复兴运动砸断了封建教会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文化、科学空前繁荣，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近代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达一千年的漫长黑夜，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人文主义思潮和自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人文主义者反对封建等级压迫，提出平等和个性自由的要求。他们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原罪论，认为追求和享受合理的幸福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他们反对中世纪神学把人贬为任人宰割的上帝的可怜的造物，而热情地歌颂人的力量、智慧和创造性。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人所普遍具有的自然的本性。人的自然本性在黑暗的中世纪被压抑了，现在是重新肯定人的尊严、人的本性的时候了。其实，这种普遍的人性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要求挣脱封建压迫、求得个性解放、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的阶级意识。因此，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有极大的进步性。

恩格斯高度地评价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认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路德、哥白尼、布鲁诺、拉伯雷、莫尔以及其他的科学家、哲学家、教

育家们绘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美最新的图画，表现了现实世界气势宏伟的景色和人的无穷的力量，谱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乐曲。

生产力的发展，迫切要求自然科学的帮助。恩格斯认为现代自然科学也应从这个时代算起。航海事业的飞跃发展以及地理上的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天文、地理、动植物方面的知识。航海和天文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和力学的发展。航海需要精确的时钟，因此它又刺激了人们对于时钟原理的研究。从这时起，各门知识如天文、地理、力学、数学以及后来的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化学等都逐渐从浑然一体的科学中划分出来。这个时代，在自然科学中作出特殊贡献的是达·芬奇。他的成就说明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他不仅是伟大的画家，而且是杰出的工程师，在机械方面有过多种发明。他还是个物理学家，在光学等领域中有许多重要发现。他研究过力学。在生物学上也从事过许多创造性的工作，解剖过不少尸体，研究过心脏功能，画出了“人体解剖图”。文艺复兴时期，为人类作出划时代贡献的是哥白尼。他的日心说是天文学上的革命。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向教会权威的挑战。由于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所以它每取得一次胜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而发现血液循环的塞尔维特则被加尔文的教徒们活活烤了两小时，然后烧死。

（2）文化的‘复古’与复兴

有些人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段和过去彻底决裂的时期，此时由于古典的罗马的再度兴旺，而使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精神

冬眠了。文艺复兴晚期的学者们认为这种解释严重地歪曲了事实。他们发现西方人一直持续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和过去紧密联系。回到古代是为了当时前进所需的智慧。在此既有连贯性也有复兴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变化根植于 11、12 世纪。在这两个世纪中，西方人在他们的文化中恢复了古希腊、罗马人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迷住和控制了他们的心灵。文艺复兴是这个过程的继续，是一段人们关心人超过关心神的时期。当过去的闸门一旦打开，人们又陷入了对古代过分虔诚和崇拜之中，以至于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人们还得重新来平衡人与神、理智与感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其实，“文艺复兴”这个名称远未能把这时代的特点表达出来，它不是古代文化的简单恢复。所谓文艺复兴，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利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束缚和教会的精神统治，需要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新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最早的一次反封建的新的文化思潮。人文主义也是指以人和自然为对象的世俗的人文学科。研究这种世俗的人文学科的新思潮的人称为人文主义者。

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封建社会逐渐解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原意指人文学科的“复活”或“复兴”。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指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二是指人类精神的觉醒，反抗中世纪的精神桎梏，追求人的个性的圆满发展。

为摆脱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文化链条和思想囹圄，资产阶级的先驱者们竭力求助于和广泛利用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成果。这是因为他们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宝库中，发现了许多与封建

神学相抗衡的积极因素。就是说，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以及和谐发展的教育理想，正好与中世纪神学教育的枯燥的教条主义和冷酷的禁欲主义形成强烈的对照。他们所利用的不仅是希腊和罗马作家著作中的文体、结构、修辞方法，而且还利用了这些著作中的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内容。古典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里在某种程度上都保存在意大利。意大利的作家和学者曾在欧洲的一切城市里搜求古代的手抄本，特别是 1453 年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大量珍贵的古典手抄本经希腊的学者带到意大利，从而使意大利有这种可能把古典的著作刊印出来。例如维吉尔的著作印行于 1470 年，荷马的《伊利亚特》印行于 1488 年，《奥德赛》印行于 1504 年 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印行于 1469 年（该书的希腊文原本则印行于 1495 至 1498 年），《柏拉图全集》的拉丁文译本印行于 1483 年（该书的希腊文原本印行于 1531 年）。经过长时期的宗教神学统治后，一接触到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的内容，使人们耳目一新。这些内容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当作宝贵的养料，吸收到自己的学说中去。同时，许多学者从欧洲各地的隐修院里搜集古代作品、手稿和抄本、雕刻和绘画等艺术品，并从罗马废墟中挖掘出大量的古代文物。所有这些，都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新航线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更加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从此重新认识了地球，中世纪神学观念迅速瓦解了。

文艺复兴受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如果认为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简单重复，是一种单纯的历史再现，认为新兴资产阶级真的是要把历史的车轮倒向奴隶占有制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不正确的。新兴资产阶级并不是真的想回到古

希腊、罗马的时代去，只是因为它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因而企图托古改制，借着复兴古希腊、罗马学术文化的名义，来实现自己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阶级要求。因此 *Humanitas* 一词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出教育的范围。它的内容也不限于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学术文化，它终于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内反封建的一面旗帜。*Humanitas* 所包含的思想诸如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意志以及由此衍生的强调世俗教育等内容，和后世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表现形态。

彼特拉克 公元 1304—1374 年 与古代抄本的收集。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通常称为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在卡盆特拉斯学习过人文学科，在蒙特皮里学习过法律。

彼特拉克是一个从使人厌恶的、压抑人们兴趣的中世纪中，从经院主义及其毫无意义的逻辑训练中，从修道生活及其所提倡的禁欲主义及出世思想中，从中世纪大学僵死的文牍主义中转变方向的人。他通过学习和研究，深深地尊崇古人和热爱古典语言。

彼特拉克不知疲倦地收集原稿，公元 1345 年 他发现了西塞罗的《致友人书》立即写信给出了名的罗马演说家 告之这一喜讯。当他不能在这些研究中得到新材料时，他便把这些原稿卖给了能给他大价钱的王公、贵族和富商，以充实他们的书房。1363 年 他把藏有 200 卷书的书房捐给了圣马克共和国。

到彼特拉克逝世时，这种收集古代手抄本的热潮风靡了整个意大利。一些杰出人物如罗马教皇波普·尼古拉斯五世和尼克里等，把他们的财富完全花到了收集原稿和稀少的手抄本上。波吉渥出席康斯坦丁会议时，发现了西塞罗的《本演说集》。与此

同时 在瑞士的圣·盖尔还发现了昆体良《演讲学校》的完整的手抄本。彼特拉克死后，仅在意大利就发现了大量的拉丁语经典著作。

彼特拉克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先驱”。他完全无愧于这个称号。但如果更确切地说，他应是古典世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桥梁。虽然他只略懂希腊文，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时那些拙劣的译本，但他却对希腊和罗马经典著作倾注了无限的挚爱和热忱。后来，他的精神成了文艺复兴的新精神。

玛鲁尔·克利索罗拉（约公元 1355—1415 年）及其对希腊文化的宣传。克利索罗拉是君士坦丁堡人，是一名古希腊语教师。1393 年神圣的罗马皇帝玛鲁尔·帕拉罗古斯派他去意大利寻求教皇的帮助以反击土耳其人。公元 1395 年他成了佛罗伦萨的一名希腊语教师，吸引了意大利和西欧各地的很多学生，他还在此翻译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

他是 14、15 两个世纪中涌入西欧的大批学者的先驱，给西欧的思想界带来了雅典的语言和黄金时代的文学。在他的影响下，麦底西的可西莫德在佛罗伦萨开办了一所柏拉图式的学院。

在意大利，克利索罗拉的学生是希腊文化最热心的宣传者。维诺拉在法罗那大学中鼓动对于经典著作的兴趣。当他在君士坦丁堡从师于克利索罗拉五年之后，带回了大约 50 本希腊文的手抄本。奥瑞斯帕在佛罗伦萨也跟随克利索罗拉学习过，他访问君士坦丁堡回来时，也带回了 238 本希腊文经典著作。另一个学生菲勒弗也拥有 50 本原稿。通过这些渠道 索福克利斯、埃斯库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普拉达齐和其他伯里克利时代著名学者的思想融入了西欧文化。

约翰·汝科林(公元 1455—1522 年)对希伯莱文的研究。汝科林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公元 1496 年汝科林移居到黑德尔伯格,成了德国教授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的权威。两年后,莱茵州的菲力普伯爵聘请他教自己的孩子。同年,他出使罗马,从那里带回了很多希伯莱文书籍。从此他致力于希伯莱文的研究和教学。他认为拉丁文《圣经》是不准确的。他作了新的努力把希伯莱课本中的真理注入拉丁课本之中,结果他写出了划时代的希伯莱语法和辞典《希伯莱语入门》。紧接着他和卡伯拉或者是卡伯拉哈合作又出版了两本书:《令人惊叹》和《犹太教神秘教义的艺术》改进了他认为神秘离奇的希腊语系统。

由于灾荒、内战、鼠疫 汝科林被迫逃离了斯图加特。他先后在因戈尔施塔特和蒂宾根教过一段时间的希腊文和希伯莱文。和偏见与蒙昧的长期斗争使他衰弱了, 1522 年 6 月在来本菲尔,他死在浴室之中。欧洲大学仍被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所窒息,并未为新时代的人文主义做好准备。可是他并没有失败,他使人文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西方的古典传统确实来自于三个方面——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莱文。

现代民族语言的形成和运用。西欧中世纪的拉丁语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学术语言,人文主义者们致力于使学者们在思想上回到古典拉丁语上来,恢复使用希腊文和希伯莱文。多数大学成功地顶住了这一压力。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如佩都阿、帕维阿却欢迎人文主义。几所新型大学如佛罗伦萨、佛罗那等甚至追随人文主义文化。大部分大学在把人文主义和古代传统的神学、法律、医学和人文学科相比时,认为它是浅薄的。

同时,由于生动的本地语言出现,由于民间文学开始萌发,使欧洲处于骚动之中。这产生了两种后果,出现了一批要求书籍

能带来娱乐的读者和自由地表现欲望和享乐的作家。后者的作品经常贬低大人物和颂扬小人物，讥讽‘高贵者’的愚蠢和可耻，启发人们使生活过得更充实和有意义。

但丁（公元 1265—1321 年）写下了《挪瓦传记》表达了他对于比特丽丝的爱。后来他写下了《Commedie》由于这首诗写了普普通通的人们，并表示了对他们的尊敬，在 16 世纪被称之为《Divina》（神曲）。这不是一首使人娱乐的诗，因为其中充满了斥责和劝慰。它通过教给人们善恶有报的知识来影响人们性格的形成。

薄伽丘（公元 1313—1375 年）写出了《十日谈》这是最早的意大利散文和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负盛名的一部。他的诗歌、故事、寓言、散文在全意大利广为流传。他对于希腊和拉丁文经典的研究为同期的学者们所赞赏。在里恩·皮拉持斯的帮助下，他翻译了彼特拉克的希腊文《荷马史诗》手稿，从而使这部史诗在西方留传下来。

以上是这些作家为维护意大利语所作的努力。科塞（公元 1340—1400 年）为英语也作了同样的努力。科塞从法国和意大利作家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了解《玫瑰色的罗马》。就象现代英国诗人对莎士比亚一样熟悉。并把它翻成了英文。他还把另一部法文名著《狮子的格言》译成了英文。他从薄伽丘和但丁那里学习情节和结构，通晓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他本人最成功的作品是《流浪汉的故事》，故事是通过一队在南方地区的贫民旅馆中集聚的朝拜者来讲述的。按他原来的计划，每一个朝拜者讲一个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讲，共有 58 个故事，实际上只写完了 20 个故事和 4 个不完整的故事。科塞既没有决定英语的发展，也未在英语的运用上有什么创新，他突出的功劳是在用当时最

好的英语写诗 适于一般阅读“，这使以后任何英国诗人不可能获得声望…… 假如他用拉丁文和法文写作。”

拉伯雷（公元 1494—1553 年）是一位修道士，也是一位医生。他写了两本著名的书，嘲讽了当时的社会，特别抨击了当时对年轻人施行的教学方法。他的著作有两部流传至今，一本是《高干大》另一本是《庞大格吕埃》。

（3）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

欧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对于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的关系，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仅注意到经院哲学是以维护神学信仰为宗旨，为教会神学服务的工具，而文艺复兴是在借鉴古典思想文化基础上兴起的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因而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性。这种倾向无视统治欧洲思想界长达百年的经院哲学对文艺复兴有任何积极的影响，会使人得出两种相继发展起来的文化没有任何联系的结论。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倾向则是贬低文艺复兴的地位和意义，认为“中世纪并非如从前人所想的那样黑暗与停滞，而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与突如其来”^①。因而主张“真正的人文主义”是经院哲学的产物。¹¹ 和 12 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远比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深刻。这种倾向漠视两种文化的不同阶级性质，混淆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错误也是明显的。

经院哲学在方法论上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方法有着肯定的联系和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经院哲学内部哲

① C·H. 豪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剑桥 1927 年版 第 178 页。

学理性的存在，怀疑思想的产生，自然世界可以认识这一观念的保留，以及理性和信仰分离论的发展。这一切都构成联系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桥梁，也是经院哲学对文艺复兴的积极贡献。

经院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一個既定的神学命题为前提而展开思维和哲学的论证。因此“经院哲学本质上就是神学，而这个神学直接地就是哲学”^①。在神学这个外在的形式和前提束缚下，哲学所固有的思维的、理念的活动是不自由的。它抛开一切现实实践和经验，把现实性放在一边，在神学信条的抽象概念中绕圈子。经院哲学借助哲学来论证神学的教条和教义，驱使哲学为神学服务，提高了神学的灵活性。但经院哲学既然要利用以哲学为代表的理性，那么它就不能将理性完全彻底地束缚死，因此，在经院哲学的神学范畴中，理性固有的思辨功能仍然保留着。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理性也在发展。

经院哲学烦琐空洞地运用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毁灭了其中有活力的因素，但它毕竟保留了以亚里斯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逻辑分析传统。高度运用哲学的分析思辨作用，以表面上的合理性达到维护信仰的目的。¹¹ 世纪经院哲学实在论的最大代表安瑟伦 公元 1033—1109 年 对于上帝存在论的证明 充分运用了逻辑三段论。在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上，虽然他强调“基督教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信仰”但他同时也指出，当我们有了坚定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经院哲学家把哲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第 279、280 页。
安瑟伦：《神人论》第 1 卷 第 2 章。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 第 290

学作为捍卫神学信仰的工具和法宝，无意中提高了理性的权能和地位。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权威解说者，阿奎那（公元 1225—1274 年）坚持认为，“基督教的某些基本真理可以不用启示的帮助而单靠独立无助的理性得到证明。”^①因此他承认在人的一切欲望中，智慧的欲望是最令人欣慰的。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为了同唯实论抗争，不得不走批判之路，不得不提供论证，这也推动了理性的发展。经院哲学不间断地运用哲学理性，维持了理性的缕缕不坠。

理性的机器一旦开动，怀疑精神必然随之产生，上帝的存在尚需证明，那么上帝权威的绝对性和当然性，以及其他神学教条的力量必然受到怀疑，人们的思想也必然从盲目崇拜的天地转到怀疑的领域。这是不以经院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12 世纪法国著名的唯名论经院哲学家彼埃尔·阿伯拉尔（公元 1079—1142 年）针对“信仰而后理解”大胆提出“理解才能信仰”。他认为“怀疑是研究的道路”，“研究才能达到真理”。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的和经常的怀疑。……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②在阿伯拉尔的怀疑精神中，已经可以看到摆脱中世纪思想习以为常的教条框框的征象。

经院哲学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的逻辑体系，不可避免地对几乎所有事物提出明确的见解，因此它很容易卷入对所有尖端问题的论战。在论战中又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哲学理性。这样，经院哲学就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

① 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 页。

②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32 页。